

在抗震救災方面,中國這種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舉國體制,既成熟又有力,令人很放心。與救災活動沒有直接關係的大多數國民,親自下場幫忙,或提供場外指導,都有點像添亂。把自己份內的事做好,倒是更好的支援。

有人已注意到,與 5 年前的汶川地震時相比,中國媒體有進步了。觀察者網主編余亮在本周發表的文章中對此做了一個很好的盤點,並總結道:“從官媒到商媒,目前都是理性佔上風。‘敢於’冒天下之大不韙的媒體至今尚未出現…到目前為止,政府、民衆基本合格,連媒體也暫時及格。套用有些知識分子愛用的話,這越來越像一個正常國家。”

接着余主編的評論,我也談一下救災在輿論進步方面的意義。

天災就是天災,人類無法阻止,也無力抗



拒,對於這一點,人類總的來說還是認命。天天罵罵咧咧的人,凡事都罵,政府沒好人,國家不是個東西,垃圾箱里凍死了孩子,黃浦江上漂流死豬,煤礦透水、城市霧霾、河流污染,都可以直指國家為元兇,據此展開大批判。但對於地震這類天災,雖然肇事者很明確,全是地球惹的禍,但卻無從追究。

顯然,這是一個特殊情况。由於元兇是老天爺,不是人類中的你我他,於是只好免除對原因方面的討伐,所有爭論都圍繞現實後果這一個方面。

在我看來,對於輿論的成長進步而言,這竟是一個難得的契機。若考慮到天災造成的生命財產損失,這個契機還是用奇高的代價換來的,更應加以特別的重視。

編者按:我在 2011 年 9 月在中國重慶參加世界華文媒體論壇大會時,認識了一位《新西蘭聯合報》社長兼總編文揚先生。他經常向本報提供他的好文章希望與伊利華報讀者分享。文揚 1957 年出生於北京市,系統工程專業研究生學歷。以往經歷包括:中國海軍軍官,諮詢公司總經理(北京),投資公司執行董事(新加坡、香港),華文報社主編(新西蘭)和自由寫作者,出版物包括四本文揚文集和一本專著《中國力》。 浦瑛



作者: 文揚

“災後輿論”會是實現進步的契機嗎？

為什麼這麼講?我來解釋一下。現實是,人類喜歡爭論,但爭論卻總是無休無止,而且常常毫無結果,永遠原地繞圈,這主要是因為爭論各方沒辦法在造成問題的原因上達成一致意見,而且還傾向於沿着因果鏈條一路追溯上去,不能在任何一個共識點上停下來。

黃浦江上漂了很多死豬,直接原因當然可以歸咎於養豬農民違法亂丟,但也可以進一步歸因到管理部門失職和地方政府的無能,據此又可以追溯到法律不健全、農民沒素質,繼續追,當然還可以一直深究到國家政治體制、國民道德水平、國人文化修養…若還嫌高度不過,那就再聯繫到孔子和基督,讓柏拉圖和穆罕默德

也都對死豬們集體順流而下這件事負責點。

當下的中國,人人都很熟悉這種彈射式的、一路暢通直達頂層的深究,所有問題無論大小都直通政治,直通道德,中間全無區隔。文革時期叫做“無限上綱”,挺恰當的,若要換個詞,也可以叫“無限追究”。

這裏的要害就在于“無限”。表面上看,思想解放么,視野開闊么,言論自由么,想怎么聯繫就怎么聯繫,怎么就不行了?

其實此事沒那么簡單。一事當前,儘量排除政治因素,暫時擱置道德判斷,在通往宏大問題的因果路徑上設置一個限制,不輕易穿越過去,這是個極為重要的思想方法。甚至可以當作衡量

一個民族的輿論界是否成熟、是否發達的主要標尺。若普遍未能做到這點,人人都帶着泛政治化、泛道德化的毛病,黃浦江倒灌中南海,死豬耳朵反挂撒旦的後腦勺,這樣的輿論界一定是混沌的、昏亂的、處在初級狀態的。

要害在于,“無限追究”嚴重干擾了事實判斷。因為,還沒等把具體問題的前因後果搞清楚,爭論各方已經一窩蜂地殺入戰場,去搶佔各自的制高點了。中國紅十字會到底有沒有貪污和瀆職的問題,和郭美美事件到底是何種關係,已經不再是問題,愛怎樣怎樣,鬥爭焦點已經轉移到派哪些人去接管紅會、或用

哪個新組織取而代之的政治問題上去了。

歷史上,科學最終掙脫了中世紀經院哲學的桎梏,獨立發展起來,如果未能擱置道德判斷、專注事實判斷,將信仰問題和科學問題分開,根本不可能。可嘆的是,直至今日,這種擱置和分隔,仍未成為中國輿論界的基本準則。

文革期間,農民在自家後院養幾只雞,也能無限上綱到“走資本主義道路”,有人因此而被槍斃。其實,今日的“無限追究派”,與此一脈相承。

回到“災後輿論”的問題上。前面說了,天災就是老天爺佔據了首要肇事者這個位置,把“無限追究”這條路堵死了,無



論懷抱多大的沖動,也知道爬上珠峰頂去和老天爺決斗沒有用。所以,客觀上製造了一個斷絕“無限追究”的輿論環境。即使還可以從樓房建築質量、政府反應速度、具體救災措施等方面迂迴地追究,但救災的緊迫性和人類的同情心也或多或少會對此有所遏制。

這就是進步的契機。既然其他時候都沒辦法形成這種難得的一致,那么天災之後的“災後輿論”就成了唯一的真實體驗。整個輿論界可以在這種體驗中反思一下,為什麼對於別的問題不能也這樣首先關注事實,暫時擱置其他?不能等到事實弄清楚並發現確實存在更深層的問題根源後再去追究?從一個老人中風倒地的畫面就能一步跳躍到“逾百人跨過不理”的憑空想象,然後又一步跳到“國人竟冷漠至此”的道德討伐,媒體跳大神般的集體昏亂能不能借“災後輿論”這個特殊環境治一治?

天災無法避免,若能利用天災取得進步,社會幸甚。 文揚 2013 年 4 月 24 日

文揚:公知是知識權力的產物

核心提示:當知識權力建立在烏托邦理想之上,而不是科學技術之上,專業主義道路就很難發展了。尤其是,代理了“烏托邦知識”的公知,也一定是對現實抱批判態度,對世俗抱反叛態度的,因為烏托邦永遠至善至美,當下的俗世永遠醜惡齷齪。至於中國當代的公知,無非是傳統的士大夫、近百年的革命者、當下的自由派的一個怪異混合。表面上看起來,革命否定了天道,自由否定了革命,三者之間是相互否定的關係;其實不然,歸根結底,天道是烏托邦,世界大同是烏托邦,自由主義也是烏托邦,三者之間完全是一脈相承的關係。

好友寒竹上周發表了一篇很好的文章《應當區分專家和公知》,主要觀點是:中國公共知識分子大多只是“意見分子”、“鼓動分子”,並無提供新知識的功能,反倒造成民粹主義氾濫,在當前的形勢下,應當逐漸被邊緣化,以讓位于專業主義的發展。

我很同意。在此也談兩點,以為呼應。

一、為什麼西方公知的誕生比中國的士大夫晚了兩千年?

在我看來,波波利金所定義的那種“受過相當教育、對現狀持批判態度和反抗精神的”西方公共知識分子,與中國傳統士大夫一樣,也是政治權力變遷的產物。從理論上講,當政治權力發生現代化,開始從宗教權力、傳統權力、暴力權力向知識權力過渡時,這種公知作為新型權力的代理者就應運而生了。

之所以西方公知的誕生遠遠晚於中國士大夫的出現,借用福山的觀點,蓋因西方的政治現代化遠遠遲於中國。

在中世紀的歐洲,社會上只有三個角色:教士、騎士和農民,前兩者統治者,後者是被統治者。在基督教傳統中,這個秩序被認為是上帝的安排,永恆不變。其時,文化、知識、藝術等尚未從信仰體系當中分離出來,都在教士的掌握之中。

所謂“黑暗的中世紀”,就是指那個時代的“反智主義”傳統。教士靠迷信統治,騎士靠暴力統治,知識毫無用處。雖然也有文人,但沒有社會地位。貴族們普遍厭惡學問,只崇尚武力技能和軍事成就,將文人視為卑鄙的小人。一位 16 世紀的英國貴族宣稱,“我寧願我兒子被絞死也不要學習字母…這種事應該留給鄉巴佬的兒子們。”

但革命性的變遷終究還是來了,從 15 世紀開始,歐洲先後在地理上與新大陸相遇,在信仰上與新教相遇,在知識上與希臘羅馬知識和新科學相遇。

這些相遇帶來了巨大的衝擊,貴族們傳統的統治方式受到了嚴重挑戰。政府要處理的事務越來越複雜,法律內容越來越複雜,連軍事技術也越來越複雜。就這樣,培根所說的“知識就

是權力”的時代到來了,經過了大學學習的官員作為一個全新的社會階層應運而生,並很快就取得了與傳統的軍事精英平等的社會地位。

這就意味着,經歷了漫長的中世紀之後,歐洲歷史上第一次,那些沒有貴族血統、沒有軍事功勳、完全憑藉知識和才能出人頭地的“小人物”,得以進入統治者階層。

這是一種新生人物,是不親自出征但卻可以指揮軍事行動的新貴族。他們注重個人品行和自我教育,而不是出身;定位于知識權力,而不是暴力權力;志在服務政府和國家,而不是家族和個人。

不難看出,新貴族的行為標準,其實完全就是孔子當年為“士”所做的規定,如“行己有耻,使于四方不辱君命,可謂士矣”、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遠”等。

但卻整整晚了兩千年。

法國法蘭西學院 1634 年開始對所有人開放,只問才華,不問出身。作為國家批量生產知識分子的一個制度化安排,此舉比中國的科舉制整整晚了一千年。

福山在新著《政治秩序的起源》中指出,中國是現代官僚機構的發明者,也是最早實現政治現代化的國家。所以,作為知識權力之產物的中國士大夫,也大大早於西方公知的誕生,是公知的先行者。

二、公知的批判性和反叛性從何而來?

如前所述,西方的公知,與西方國家的政治現代化同步誕生,同時伴隨着一個從服務貴族到服務國家的升華。

對於大多數人來說,這個升華就到頭了,因為國家已經至高無上了。儘管知識體系自身仍然在膨脹,但主要是“橫向”的專業化細分,再沒有更多“縱向”的、超越國家觀念的新知識了。因此,大多數知識分子就沿着知識體系的“橫向”發展轉入了專業主義道路。這一點,在二戰後美國的“社會科學”、“文化理論”等領域,表現得尤其明顯。

但中國士大夫的情況卻大不一樣。若從周朝算起,中國的士大夫甚至在國家成型之前就已出現了。他們的“心憂天下”情懷廣闊無邊,在“天下”這個宇宙秩序之下,國家和君王也都只是組成部分,都需要服從天道。他們的“士志于道”志向堅定不移,在“三代”這個烏托邦標準之下,所有的後代都禮崩樂壞,都需要克己復禮。

荀子說“從道不從君”,孟子說“樂其道而忘人之勢”,連孔子都說過“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”,

更不用提老莊和佛祖了。

這個特殊的烏托邦精神取向,恐怕可以解釋中國知識分子與專業主義道路的無緣。由於始終有一個“道”在更高的位置上召喚着,中國的公知就抱定了“士志于道”的信念,哪兒也不去了。任何的專業化和職業化方向,都只能是離“道”越來越遠,近乎離經叛道,我堂堂士大夫怎么能鑽到那些個破地方去呢?

美國漢學家列文森在《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》一書中對此有極好的論述,他說:“他們(指明清士大夫)是全整意義的‘業餘愛好者’和人文文化的嫺雅的繼承者。他們對進步沒有興趣,對科學沒有嗜好,對商業沒有同情,也缺乏對功利主義的偏愛。他們之所以能參政,原因就在于他們有學問,但他們對學問本身則有一種‘非職業’的偏見,因為他們的職責是統治。”

其實歸根結底,這種“非職業”傾向也是一種“職業”,就是關於“道”的專業。但由於“道”太高深莫測、虛無縹緲,完全無法通過實在的科學方法來把握,只能通過文化描述或審美體驗來若即若離地接觸。這也就是中國士大夫在文學、繪畫、書法等領域都只求空靈、寫意等“虛相”,

不圖邏輯、比例、透視等“實相”的終極原因。

由此可見,當知識權力建立在烏托邦理想之上,而不是科學技術之上,專業主義道路就很難發展了。尤其是,代理了“烏托邦知識”的公知,也一定是對現實抱批判態度,對世俗抱反叛態度的,因為烏托邦永遠至善至美,當下的俗世永遠醜惡齷齪。

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法國和俄國涌現過更多的公知,而英美則在“最後的知識分子”消亡之後徹底轉入了專業主義道路。原因無他,法國和俄國的文化,更接近中國文化,都有很強的烏托邦理想;而英美由於有一個經驗主義和懷疑主義的哲學傳統,最終成功割斷了原有的烏托邦情結。

至於中國當代的公知,無非是傳統的士大夫、近百年的革命者、當下的自由派的一個怪異混合。表面上看起來,革命否定了天道,自由否定了革命,三者之間是相互否定的關係;其實不然,歸根結底,天道是烏托邦,世界大同是烏托邦,自由主義也是烏托邦,三者之間完全是一脈相承的關係。

烏托邦代表了一種超驗的、至上的、終極的知識,從中幻化出來的那個批判一切的知識權力,才是公知們的不滅真身。

文揚 2013-04-17

ZAK FUNERAL HOME

OVER 100 YEARS SERVING ALL FAITHS

✦ 成立于 1890 年

✦ 家族所有並運作

✦ 私家和安全的停車位

✦ 提供各種宗教信的殯葬服務

✦ 合理的價格

✦ 新近裝修的儀式大廳

身在社區 服務鄰里 無上榮幸

提供傳統服務,並可按亞裔民俗習慣提供特別殯葬服務 (備有翻譯)

我們保證克城地區同類服務最低價格

各種棺木骨灰盒 10% off

Zachary A. Zak – 執證殯葬服務專家
6016 St. Clair Ave. Cleveland, Ohio 44103
電話 (216) 361-3112 傳真 (216) 361-2540
網頁 www.Zakfuneralhome.com